

我們被洗腦，所以承認自己是半文明

劉禾，哥倫比亞大學，文化縱橫，2016-08-23

<http://mzfxw.com/m1/show1.php?classid=18&id=70503&style=0&cpage=136&cid=18&bclassid=4>

文明的等級從野蠻到蒙昧不開化，從蒙昧不開化到半文明，再從半文明到文明開化，體現了我們所熟悉的進化論的歷史觀。無論是五級、四級還是三級文明等級，這個文明的標準萬變不離其宗，到了19世紀逐漸趨於經典化，經典的文明標準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種族都囊括其中，它被編入國際法條文，寫進教科書，嵌入歐洲列強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之中。

■ 即便重新給“文明”下定義，也無法取消文明等級的存在

搜狐文化：您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彙集國內一流學者參與寫作，從“文明等級”這個概念出發，探尋近代的世界秩序。您在書中使用了全球史的角度。您的“文明等級”角度與之前的濱下武志、沃勒斯坦有關全球史的論述有何不同？

劉禾：我在〈序言〉裏已經說明，我們這本書所做的不是概念史、思想史，而是對話語實踐的研究。通過考察歷史上發生的話語行為、寫作行為、印刷行為、圖表行為、繪圖的行為、空間展示等，我們想揭示五百年來以“文明等級”為核心所構成的世界秩序。需要注意的是，我們說的是現代“文明等級”，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文明，比如古代文明、古希臘、古埃及文明等。

這本書的出發點不是如何定義“文明”。無論怎樣界定這個概念，它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文明等級的問題。為什麼？因為思想是在社會實踐中發生的。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社會實踐總要迫使人們對自己使用的概念重新解釋、重新定義、重新發明。因此，不能因為要做學術，我們就可以只顧定義，不顧歷史，粗暴地把概念和它的歷史實踐割裂開來。

這本書研究的不是泛泛的文明問題，而是考察“文明的等級”是在怎樣的歷史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的方法與濱下武志、沃勒斯坦的研究完全不同。比如沃勒斯坦，他一直研究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有中心，有邊緣。但問題是，現代文明等級的建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兩者之間有沒有根本的聯繫？這個問題甚至不在沃勒斯坦的視野之中。

我們在書裏提出問題恰恰與這個有關。比如，西方國家早期殖民擴張，曾以貿易通商為名，對地球上的資源和市場實行劃分和佔有。這涉及到唐曉峰教授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討論的地緣政治。從哥倫布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到兩年後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之間簽署《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在大西洋上劃定第一條地球子午線，我們可以說，現代世界秩序起源於1494年的那條子午線。這是我們在書中不斷強調的地緣政治。因為這條縱貫北極和南極的子午線，第一次把整個地球的資源——陸地和海洋統統包括在內——在兩個歐洲強權之間實行了平均分配，地球的一半屬於葡萄牙，另一半屬於西班牙。16世紀初，他們在太平洋上劃出另一條子午線，為了更加嚴格的勢力劃分。憑據這兩條子午線，明代的中國自然就落入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因此才有了1521年的那次屯門海戰。

不過，我們這本書研究的地緣政治是雙重的，它不僅包括地球的空間，而且還包括一個圍繞“人心”的地緣政治，那就是文明等級在全球範圍內的建立。在這裏，我要特別強調地緣政治的這種雙重性，它既是地理空間的，又是訴諸“人心”的。近500年以來，歐美人發明的“文明等級”是另一種地緣政治，它圍繞著“人心”展開，很有說服力，也是征服地球人心的最強有力的“公關”手段。這個重要話題在國內外幾乎還沒人碰，因此它成為本書的焦點，是完全及時和必要的。

我們借福柯的話來說，“文明等級”的發明需要一系列的話語裝置(dispositif)將其推進，它不是某個人的思想或者某一些概念所能形成的合力。從這個角度來回看沃勒斯坦、濱下武志等人的世界史研究，就會發現他們的盲點。比如，為什麼“文明等級”這個圍繞“人心”展開的地緣政治，在這些學者的研究中長期缺席？

[搜狐文化：西方人通過“文明等級”的劃分，是不是從觀念上確立了西方海外殖民擴張的合法性？](#)

劉禾：不僅僅是觀念。比如，姜靖教授在本書中分析的萬國博覽會，尤其是1854年英國的水晶宮博覽會、巴黎萬國博覽會、以及日本的大阪博覽會等，文明等級簡直是無孔不入。它通過空間的展示、物質文化等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重申誰是文明人，誰是野蠻人。當然，還有地理學或科學的確認，歐美人通過地圖繪製、子午線的建立、海外科學考察，全面實行對世界的瓜分。這不僅是觀念的問題，而是勢力範圍的確立。比如西班牙的戰艦能不能進入葡萄牙的轄區？這就不是一個觀念問題，而是誰有能力和資格統治世界的問題。

■ 哲學家洛克為殖民統治貢獻的思想法寶

[搜狐文化：西方人的“文明等級論”其實滲透進了方方面面的內容裏面。](#)

劉禾：是的。在這本書的前言裏，我提出了地緣政治的兩重性，這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軍事和政治意義的地緣政治一般不難理解，但訴諸于人心的地緣政治——文明等級在全球的普及——轉化為人們的無意識以後，看不見，摸不著，而它無處不在。在當代中國，人們張口閉口講文明，越講越焦慮，這是為什麼？是不是說明人心現在又一次被文明等級的話語俘獲了？

“文明等級”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套話語。話語既牽涉到言說、書寫和印刷，也牽涉到圖畫、圖表、空間展示等媒介。它們通過編輯、剪輯等手段，對人的感官和意識施加影響。在這本書中，郭雙林教授研究的晚清人編譯的地理教科書裏面，就有大量的版畫插圖。這些視覺形式很形象地確立起西方“文明”高於中國“半文明”的世界版圖。剛才提到姜靖教授研究的萬國博覽會，比如1854年的那次博覽會，英國設立了自然歷史廳，裏面展示人類進化的過程，尤其對動物和有色人種的展覽，這些空間設計是在視覺上乃至實物標本的文化實踐層面上向全世界普及和傳播文明的等級。

在過去的幾百年裏，中國和亞洲就是在上述過程中被歐美人定義為“半文明”國家。梁啟超將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的內容轉抄到中國，福澤諭吉則是編譯了歐美人的文明等級，承認日本人是半文明，才提出他的“脫亞論”。福澤諭吉的論述，經由梁啟超等晚清改良派傳入中國，潛移默化，漸漸使中國人也開始接受歐美人的文明等級和世界秩序。

我們再來看國際法的思想基礎，這是書中我自己的文章所涉及的主題。國際法，簡單來說，就是規範國與國行為的一套法則。但我在研究中發現，國際法的思想基礎其實在法律之外，文明等級的設立才是國際法的法理基礎。比如我在文章裏著重分析了一個國際法概念，叫terra nullius，即“無主荒地”。什麼是無主荒地？歐洲人為實行殖民擴張，必須佔領他人的土地。但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首先在法理上確認，哪些土地是無主荒地，哪些不是。

“無主荒地”究竟意味著什麼？從“地理大發現”以來，它有一個確切的所指，針對的是美洲、澳洲等地的原住民的土地。前來發現無主荒地的歐洲探險家，每到一地，必須首先作出判斷，當地的原住民對於他們生活在其中的土地是不是具有合法的擁有資格？如果當地的原住民被歸為savages“野蠻人”，那麼答案就是否定的，因為野蠻人的土地就是無主荒地。國際法認可的“佔領說”(the doctrine of occupation) 適用於“無主荒地”。誰先發現這塊土地，誰就有權實行合法佔領。

正是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在17世紀發明的勞動價值論，給國際法和殖民統治送來了思想法寶。這個思想法寶來得及時並充滿說服力。我們知道，洛克在《政府論》中，對土地、勞動和財產所有權之間的關係做出了最為系統的闡釋。他的基本主張是，土地的所有權取決於勞動者對土地的開發和耕作，勞動不僅創造價值，勞動也是財產所有權的基礎。洛克的勞動價值論影響深遠，除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領域，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也從中獲得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但長期以來，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一個問題，洛克為什麼如此強調土地，為什麼強調農耕勞動與土地所有權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我在書中提供的答案是，因為洛克當時正在為大英帝國的美洲殖民機構服務。從1668年到1671年，洛克被沙夫茨伯裏伯爵委任為英國殖民地的貿易與種植園委員會秘書長，代表皇家殖民地產所有者與開羅來納和巴哈馬兩地的英國殖民官員進行溝通，起草並制定英國在美洲的殖民政策。我們從洛克《政府論》第二篇中的“財產”和“征服”幾章所引述的美洲案例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但“無主荒地”的法理，一旦碰到印度、中國、東南亞等“半文明”國家，就馬上失去效用，因為這些地區大都農業發達、歷史悠久、具有自己的社會形態，他們在歐美人的文明等級上處於“半文明”或“蒙昧”(barbarian)的地位。既然歐洲人無法證明亞洲人的土地是無主荒地，那麼他們只能尋找別樣的佔領方式，比如建立治外法權，土地割讓等。

讀近代史，我們看到中國的領土曾經多次被割讓。《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公共租界成立的混合法庭，也叫「會審公廨」，正是這樣一個典型，它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司法權受到另一國家的侵犯。根據國際法，文明國家之間實行主權平等，因此西方國家絕不會在這個意義上相互使用“治外法權”。治外法權是主權的例外，它意味著不承認對方國家的主權。那麼，對方國家的主權能否得到承認，則取決於它在世界文明等級上的地位。“治外法權”和“土地割讓”在亞洲國家是最普遍，最常見的，那是因為歐洲人事先就把亞洲人的劃入“半文明”的等級。

總而言之，文明的等級從野蠻到蒙昧不開化，從蒙昧不開化到半文明，再從半文明到文明開化，體現了我們所熟悉的進化論的歷史觀。無論是五級、四級還是三級文明等級，這個文明的標準萬變不離其宗，到了19世紀逐漸趨於經典化，經典的文明標準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種族都囊括其中，它被編入國際法條文，寫進教

科書，嵌入歐洲列強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之中。

■ 我們被人洗了腦，所以承認自己是半文明

搜狐文化：“文明等級論”的背後是不是有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所確立的進化論的觀念？

劉禾：如果你指的是生物進化論，那它的出現比文明等級論晚很多年。這件事要反過來看，文明等級論在先，達爾文進化論在後。19世紀初期出現的大量政治地理學教科書、人類學著作、文學和歷史學，已經處處帶著文明等級的思想印記，這種歷史進步主義在時間上大大早於達爾文提出的生物進化論。什麼是歷史進步主義？它裏面既含有歐洲啟蒙思想的進步觀，例如亞當·斯密以來的社會階段論，又有後來從孔德那裏吸收的社會學實證主義的發展觀，在我們看來，它更是積累了歐洲人自從地理大發現以來在全球各地積攢的殖民經驗。

搜狐文化：但直到現在，中國人還是以西方的文明做為發展的標準。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夢想就是成為文明人。

劉禾：說的不錯，這裏有一個洗腦的過程。我們現在的很多發展觀仍然不能脫離西方人設定的“文明等級”。我們也許離梁啟超、福澤諭吉那個時代並不遠，骨子裏還是不承認自己是文明人，甚至有人說中國所有的問題就在於中國人不文明。

■ 我們認為近代農村骯髒和野蠻，是受傳教士觀念影響

搜狐文化：我們現在可以讀到大量晚清時期留下的傳教士寫的書。他們描述了中國鄉村的不文明行為，比如街道的骯髒，中國人的粗俗甚至野蠻。這難道不是不文明的體現麼？魯迅曾經特別推崇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寫的《支那人的氣質》這本書。這本書裏面詳細描述了中國農村的骯髒，農民如何野蠻的事實。

劉禾：不僅如此，我記得明恩溥還說過，把支那人放在手術臺上，一刀割下去，他不會叫痛，因為粗俗野蠻的支那人身上沒有疼痛神經。你信他的話？傳教士批評異教徒不衛生，不道德、農民多麼粗俗，這是老生常談。他們不僅批評中國人，也以同樣的口氣說非洲人、印度人、美洲原住民、澳洲原住民，以及所有與新興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同的傳統社會。

其實，不信上帝、不講道德、不遵循現代人的衛生標準，這是三種完全不同層次的行為，在傳教士那裏都成了文明與野蠻區別，這說明了什麼？

在明恩溥的筆下，山東農村的“骯髒”總是相對於他所熟悉的美國而言的。山東龐莊，一個北方鄉村，是不是能代表整個中國？這要另說。早在傳教士到來之前，城裏人也會歧視鄉下人，穿長袍的瞧不起穿短衫的，有錢人瞧不起要飯的，這本來沒有什麼新鮮的，不必只是糾纏“骯髒”這一點。可現在又多了兩條：美國人瞧不起中國，於是中國人也開始瞧不起自己。

❖ 明恩溥《支那人的氣質》（今譯為《中國人的氣質》）